

优化政策组合 主动创造外需空间

张莱楠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疲弱的消费需求严重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复苏进度,其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严重损害,居民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杠杆化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既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

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难补上,全球经济都呈现出总需求不足的状态,特别是今年以来,欧债危机的急剧恶化、欧洲经济增长停滞,以及全球经济二次放缓,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中国不仅要稳定“外需”,更要积极地创造“外需”,这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笔者认为,在现行“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以及“加工贸易政策”三项政策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出口贸易布局势在必行:

首先,优化国际市场布局。要稳定传统市场规模,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以培育竞争新优势为出发点,选择部分重点发展中国家,大力开

拓新兴市场,扩大新兴市场的规模。2011年我国与发达国家双边贸易增长18.3%,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增长27.0%,比发达国家快8.7个百分点。以俄罗斯为例,现在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增长40%,今年前五个月累计增长24.4%。在中国对其他发达经济体贸易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依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未来中国应该扩大与俄罗斯经贸投资合作,重点推进能源及上下游合作、资源深加工、联合机电制造等大项目合作;开展高技术和创新合作,中国应该进一步挖掘对俄以及其他新兴市场贸易合作的潜力。

其次,优化国内区域布局。要稳定东部沿海地区外贸规模,提升外贸发展水平,以内生增长能力建设为出发点,重点发展沿边省区和近年来发展潜力巨大、成效显著的中西部地区,加快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扩大中西部外贸规模。中西部地区近年外贸发展势头迅猛,2011年中西部地区外贸增长42.0%,比东部地区快21.6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毗邻中亚市场和东南亚、南亚市场,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很大,要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再次,优化贸易结构布局。把稳定出口与加快贸易结构升级结合起来。从目前情况看,有充足订单和刚性外需的大部分是技术密集型的机械和装备制造,可以通过加大贸易融资、出口信贷和保险支持等向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高新技术等行业倾斜。

此外,要加快中国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大对欧美投资力度。在中国出口和利用外资大幅下滑的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上扬。一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原材料、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国内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走出去”内生动力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危机也使得海外资产收购变得更加可行。例如,由于希腊政府迫于偿债压力而大量出售国有资产,中国企业正借此之际瞄准希腊港口、电讯、银行服务、汽车产业、铁路设备、房地产、啤酒厂、电子工业、服装和玻璃仪器等多项领域。数据也显示,中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的流程、技术、知识产权和品牌,消费品和工业品行业的海外并购交易也在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对美投资也出现快速增长势头。近日,中美双方签署了42项合作协议,签约合同金额共计约34亿美元,这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对美投资。事实上,时势易,全球及美国经济的变化已迫使美国政府

不得不放下身段,主动吸引外资。

近一段时期,“投资美国”正在成为美国社会走俏的热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实业投资及其带来的新的生产能力来实现经济走出困境,并分享全球资本带来的盛宴。当前,全球资本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直接投资主要是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但未来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额将出现爆发式增长,开始流向发达经济体,对于中国来讲,这是一次角色转变的重大机遇。

未来,国家需要不断完善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实现对外投资的便利化;通过与投资目标国达成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保障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利益;推动建立海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构建安全高效的平台。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设立特别基金,例如英联邦开发公司、德意志开发公司、丹麦工业化基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损失准备金制度”等,帮助企业提高海外融资的便利性。

事实上,“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双重矛盾常态化的背景下,通过战略调整和结构优化,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不失为一种良策。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反腐败 关键在于完善体制



李斌

近日阅读郎咸平、杨瑞辉两位教授合著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书,两位教授在书中谈道: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虽然分属不同的流派,但二者其实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反腐败。亚当·斯密与马克思都痛恨官商勾结,压榨穷人。亚当·斯密鼓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要求官商分开;马克思则是主张通过民主与法治手段,来改变政权的压迫性质。

我无意全面评论这部著作,但是,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反腐败”绝不是一件小事情;一种社会制度,一个政治体制,绝不是先设计好这个制度以后,再来考虑如何消除腐败;“反腐败”的考虑要成为制度设计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对制度作大改动,甚至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选择和建构的方向。领导人讲讲话,文件中写一段;无论这个领导如何清廉,如何贤达,如何勤奋,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毛毛雨。

一个不具有自我净化和再生能力的体制,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体会最深。在古代,一个朝代,开国时期往往最为廉明,原因在于掌权者具有下层生活的实际经历,目睹了前朝的腐败。这种警觉感经由口口相传,通常可以维持几代人。然而一般说来,几十年后“开国效应”即告耗尽,政权随之也就陷入了腐败和动荡之中。汉、唐、宋、明等几个主要的汉人政权,莫不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种传统的儒家君主制缺乏自我净化能力,它内在着一种缓慢的、然而却是系统性的崩溃倾向。通过阅读史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倾向。

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学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名震一时。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帝制政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王朝更替数千年,总是帝制的往复轮回;可见,这种体制具有一种“超级的稳定性”。对于这个理论,我们必须作出反驳。首先,王朝更替往往经过战争与杀戮才能实现,社会动荡以至于此,这能算是一种“稳定状态”吗?新王朝替代旧王朝,不能说这是旧体制“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因为那个旧体制已经不存在了。这就好比说一个人从疾病中康复了,而另一个人病死了;你不能说“病死”也是康复的一种方式。旧王朝崩溃之后,人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选择重建帝制;这并不是因为旧制度好得让人沉迷其中,而是因为有限的历史实践中,我国人民的确没有能够发明出可以与帝制相竞争的其他制度,加之东亚大陆在地理上的封闭性,其他更为优良的制度(例如民主制)也没有能够传入。没有竞争和自由选择就谈不上哪种体制稳定,哪种不稳定。在我的老家陕西,在改革开放之前,村民们在冬春季经常只能吃玉米度日,这是因为白面很少,但是玉米吃多了是要拉稀的,你总不能说“冬春季吃玉米”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吧!所以说,这种理论真的让人很无语。

事实恰恰相反:专制制度具有一种不稳定的本性,它在长期内具有一种强烈的、系统性的、几乎不可抗拒的腐败趋势。这是我国古代大多数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相信大多数读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为了挽救自身的腐败,统治者常常会进行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宣传。于是,“唱高调”也就成为一切专制政体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还是从儒学讲起。儒家治国的方法建立在“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之上;它要求人们自觉地做君子,不做小人。但是,实际情况是,君子虽然可以享有较高的道德地位,却必须安于清贫,必须用钢铁般的意志来忍受低于常人的生活标准。如果你想要过得宽裕一些,那么,贪腐即使并非华山一条路,也是一种捷径;至少,还有大量暧昧的灰色地带可以涉足。于是,传统的官场社会往往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这里至少有三类人:一是少数的道德楷模,被人家树立起来,供奉起来,只好暗中叫苦,一条道儿走到黑;二是大量的贪腐者,虽然得了实惠,却失了人格,只能“苟活”,不能挺起腰杆做人;第三类则是君主,一面对别人进行思想品质教育,另一面则从心所欲,全无忌。我同情清官,也同情贪官,因为正是制度分裂了社会,压抑了人性,制度把人变成了鬼。儒家试图建立高于法治的“美好社会”,其结果是每一个“盛世”都在混乱中收场。

建国以后,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从算法的角度看,它却并不正确。一个社会不可能脱离它的历史。有形的东西可以打碎,无形的思想却会顽固地继续存在。各种政治运动搞来搞去,结果还是旧的一套最为得心应手,甚至更加泛滥。改革开放为我们根除体制性的腐败提供了良机。可是,时至今日,一说到反腐败,有些人仍然是高调唱得山响,尽讲一些正常人听不懂的鬼话,却不去认真地检讨、反思和纠正制度上的种种弊端。这些人的“反腐败”未必是真诚的,客观上他们其实是在为特权和腐败打掩护。有的人属于糊涂,有的人则是用意很深,是“顾左右而言他”的技巧。

以“统计腐败”为例。统计机构要独立而透明地运作,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通例。然而,在我国,统计数字向来都是一个敏感而又神秘的话题,统计数据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统计部门要接受上级统计部门和同级党政机关的双重领导,什么数据可以公布,什么不能公布,以及何时公布,都有长官意志存在于其中。想想看,要服务于人民,假若不了解实际情况,它又如何作出正确决策呢?人民不能及时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又如何评判政府工作的好坏呢?可见,长官意志干预统计工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遮丑,掩盖问题,粉饰太平,避免接受人民的评判和民意的压力。这只对长官个人有利,丝毫谈不上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反之,假如我们立即采取适当的举措,使得统计机关真正独立于一般的行政部门,只受专家的领导和民意机关的监督,并且全面放开民间调查机构参与竞争,那么,各级政府机关都将会长久地处于真相的压力之下,行政的积极性也就可以长久地得以保持;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拒腐防变”的方法啊!所谓的“自我净化与更新能力”,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由于我国统计机构缺乏独立性,国家和人民曾经因此遭受过极为巨大的损失。例如,“跃进”年代各地对于粮食产量“放卫星”,连最高决策层也搞不清楚真相究竟如何。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对此懊恼不已。不时有人质疑我国的统计数字(包括检测数据),这本应成为我们闻过辄改、重建信誉的机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总有人不愿意正视质疑,反斥之为“居心叵测”。如果一家餐馆的确发生过卫生问题,就不要抱怨客人老是怀疑它。知道了造假严重后果,知道了重建信誉的不易,就应该牢牢记住,从体制上设法予以根本的杜绝。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动用住房公积金建保障房 应多听听各方不同意见

吴睿鹤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纪委委员、综合计划处处长包林梅介绍,2010年住建部开始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试点工作。当年北京市争取到210亿公积金贷款额度,支持保障房建设,约占全国试点范围的一半。

随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于2009年颁布实施《关于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住房公积金建保障房已开始启动。今年4月份,住建部又邀集数位房地产开发商,就住房公积金管理问题展开讨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第二次修订前期工作已启动。其中,有建议称进一步放开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试点,也就是说目前由政府机构管理的公积金将有可能更多地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之中。

尽管公积金贷款建保障房,在北京包括全国其他地方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我还是想泼盆冷水。因为,动用住房公积金,不仅要征求缴纳人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还必须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而现在,住房公积金俨然演变成了政府部门私设“小金库”,想咋用就咋用,不受任何约束。

结合现实国情分析,动用闲置公积金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显得有些不合理,底气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公众齐声反对。最近,由搜狐网组织的“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保障建设”网络调查中,85%的网友反对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理由是住房公积金属于个人缴存,应征求住房公积金缴纳人的意见。虽然这个调查结果未必完全代表民

意,但如此高的反对率,不能不引起主管部门的深思和关注。

与此同时,现行法律条文不允许。《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第五条规定,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倘若从这个视角分析,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显然与现行法律条文发生了抵触。

保障性住房原本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财政公共资金,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土地出让金。尤其在现在,每年全国各地政府就有一万多亿的土地出让金进账,住房建设部也规定了土地出让金的70%,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所以,动用土地出让金既完全有财力保障完成,又要远比动用老百姓的公积金合理、合法。

此外,公积金监管和收益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棘手。比如,各大媒体都报道的广州公积金中心“公积金一年的管理费用超过2000万元,人均管理费超过27万元”的新闻。如果现在公积金被用来贷款建设保障性住房,势必会涉及与收益体感相关的管理费问题,这不仅会增加监管难度,也难以管好这部分公积金贷款的收益分配与去向。

总而言之,动用公积金建设保障性住房,尽管可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率,但从法律依据和监管难度上看是非常不妥的。因此,在动用这块属于普通老百姓的大块“奶酪”之前,有关职能部门必须深思熟虑,避免恣意损害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

(作者单位:河北省威县国家税务局)

焦点评论



发改委官员称将继续推动水价上浮 ICLONG/漫画

谁拖了中国资本市场迈向一流的后腿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2012年6月29日,内蒙古草原,历时13天后,三个中国人再次回到地心引力的怀抱。当三名航天员在直播镜头前被搀扶出舱的时候,谁也无法质疑这样一个陈腐性的语句:在载人航天技术上,中国是世界一流的。尽管舆论中有不少对耗资巨推动航天事业的不懈,但用《北京日报》的话来说,“相较于美国每年超过170亿美元的航空航天预算,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到现在共约390亿元人民币的总经费并不多,取得的成就却是巨大的,被世界所瞩目公认。这是完全值得国人自豪的国家进步!”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在陆家嘴金融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语出惊人:中国资本市场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一流。这一句话,在业界激起了巨大反响。

愿望是美好的,但短期内,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

却并不乐观。因此,郭树清主席在提出“世界一流”这一目标的同时,也强调,“我们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实现这个目标,相反必须要脚踏实地地实现这个目标”,要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需要下苦功夫”。他提出了六大任务:坚定不移地深化发行退出制度的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体系;狠抓上市公司治理完善;以更大的决心、更细致的服务培育机构投资者;不断提高效率;以及坚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于郭主席的“世界一流说”,经济学家们作出更为丰富的解说,他们认为,世界一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市场规模;二是管理水平;三是投资工具;四是投资回报率。而第四点则是核心,投资回报率上来了,市场规模自然不在话下,管理水平也体现出来,投资工具的丰富更加容易解决了。职业投资人黄生在微博上指出,“什么时候成了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第一,那才是真的第一。”

面对短期市场的疲弱走势,郭树清在28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仍对市场充满信心”。尽管他说“四新一新政”是媒体的“误会”,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就任证监会主席以来,鼓励分红、积极引导长期资金入市、大力发展公司债、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均显示出他对整顿市场、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决心和努力。

今年陆家嘴论坛的主题是“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三名宇航员天上13天,而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则已持续了30年,促成了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根本改变”。这正是郭树清主席提出“资本市场世界一流”的底气所在。但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深入改革承担着全局性的历史责任。”

随着陆家嘴论坛帷幕落下,2012年也正式走完了一半。股市里有“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说法,即:5月卖出离场,6月更会大跌,7月则会起死回生。当然,这也许只是股民们美好的愿望,但无论如何,7月,还是有值得期待的地方,如党的生日,香港回归15周年纪念等。而我们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成立也满一周年了,正式开始下一年的征程。对于舆情,我们是这么理解的——上古时期,洪水泛滥成灾,大禹临危受命,详细地勘察,了解山川地貌,摸清洪水走向,制定治水计划。开山凿渠,疏通水道,13年治水终获成效,洪水顺势奔流入海。大禹因势利导,化水患为水利,传为千古佳话。舆情虽异,其理相通,导则成利,堵则生患。

(执笔:钟钦政)